

至还败坏了社会的道德秩序。有一名例：某城一位人人认识的百万富翁失足河中，有人费力将其救起，富翁却只拿出一块钱示谢，路人纷纷起而指责富翁。这时，走过来一位道德家，却反过来指斥救人者，责问他为什么没悄悄走人？还要领什么赏？似乎该受批评的是救人者。

茅先生认定：在制度设计中，平等对称地处理社会成员之间的利害关系，才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道德原则，才能可持续发展。如计划经济时代，你上菜场挑挑拣拣，营业员会勃然大怒，理直气壮地指责你“自私自利”、“损公肥私”，差的东西你不要他不要，损失的就是国营菜场。这种时刻，顾客羞愧满面落荒而逃。而在这义正词严的背后，菜场因为经营垄断可以不负责任地进货，反正顾客必须克服“自私自利”，营业员也总是拥有“首选权”——首先为自己和亲戚留下最好的，反正顾客看不到，无法指责其“损公肥私”。买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，自然无法形成良性循环，只能助长恶性的“开后门”，只能制度化地败坏社会道德。那时候，“我认识菜场里的XXX”，可是一笔很值得炫耀的社会资源呢！

30余年的计划经济，从设计理论上来说，其出发点与依赖点均建筑于道德基础之上，要求人人成为雷锋。实践证明，这是行不通的，缺乏普遍可行性与社会操作性。而且，从最根本意义上，人具有一定的利己心并不坏，设计合理的运行轨道与社会秩序，才是高妙的因势利导。左倾思潮不仅阻滞了经济的发展，更阻滞了观念的发展，甚至反向推进，留下许多似是而非的道德问题，成为我们今天的绊脚石。日前本人访港一月，发现香港在这方面做得很好，观念要先进得多。仅仅一个香港中文大学，触处可见各项善举——李卓敏楼、蒙民伟楼、田家炳楼……一位位捐楼人无言地在召唤后继者，推动着全港教育的发展。这有什么不好呢？更何况在内地不少见义勇为者流血还流泪；不少见义勇为者乃农民工，受伤之后无任何医疗保障，受伤的所有损失（甚至失业）都得自己扛下来，使原本就十分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，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家庭矛盾，甚至老婆叛离而去。此时，媒体介入与社会关注所形成的道德奖励与捐赠恤金，不仅仅是十分必要的回报，更是对后来者的鼓励。 □

天才的睿智与

——郑观应及其《盛世危言》

晚清时节，外患内忧加剧，国势险恶，几陷万劫不复之境地。但那也是志士崛起、豪俊辈出的时代。林则徐、魏源、徐继畲、容闳、郭嵩焘、王韬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……一时俊彦迭出，他们的思想巨著今日读来犹令人心如卷澜，汗涔涔下。郑观应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郑观应，广东香山人，生于1842，卒于1922年。少年时期即远游上海，弃学从商，后长期于洋行任职。与洋务大员交谊日深，先后任织布局总办、上海电报局总办，后又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，其间思索结晶也日益宏富。其后又应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之招，潜往西贡、金边侦察法人军情，为国效力。其为人或经商均方正而有转圜余地，责己严而待人宽。终因人事挫败受诬于人，乃退往澳门，倾力撰述《盛世危言》。

《盛世危言》1894年刊行。其于政体则倡“立议院、达民情”，于洋务派则指出其“舍本图末”，经济方面则主张民办企业，与列强之商战抗衡，文化建设则办学藏书，军事上“人”、“器”并重。观其《条陈中日战事》之分析及行止，可谓军事情报之天才及商战之第一流高手。《盛世危言》在政治方面超越同侪之处在于，强调立宪为首要的议会政治；以此为背景，传媒、商业、文化……方有真正依托。故张之洞读毕《盛世危言》由衷叹曰：“论时务之书虽多，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。”书中纵论

洞见

■ 伍立杨



学校、考试、藏书、公举、邮政、农功、铁路、保险、边防、练兵……卓见迭出，系统有致，确为同盟会大举、党人报刊大量出现之前，最为恢宏峭拔、言之有味、言之有物的著作。他在举行自由公正选举、扶助自由负责的媒体、创建独立的司法体制和通过国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等方面，都做出了令今人惊讶不已的卓越论述。

郑观应的高明在于，强调政体的优先、政体的决定性和根本性，它是社会正常和谐发展的根本。他的价值观念扎实超越了器物的现代化，而进入制度层次的现代化，甚至思想层次的现代化。它指出这样的路径：倘若根本性的要件弃置不顾，则其它方面无论有多少的法律、条规、经略、谋划……都是治标不治本，进展缓慢，或不进反退，甚至走向文明进步的反面。而一切形式的专制者对此总是深惧而阳奉阴违的。

对民主政体深入骨髓的认识，乃因其杜绝舞弊之科学、之严格、之有效。他论述议员、选举之关系，“为国人所举。举自一人，贤否或有阿私；举自众人，贤否自有公论”。定位之精确无以复加，如此实行，可令天下英奇才智之士得以施展。当时，国人也有疑问，以为中国唐宋以来之台谏、御史，不就和西方的议员一样的性质作用吗？郑观应直接指出其本质的不同，盖中国之传统专制下，谏官必顾私恩、讲门第，同时于民情也相当隔膜，其间还有智愚贤不肖的区分，沽名钓誉者还有那个制度保其行径，致生很多麻烦；议员则不一样，他们普遍选自民间社会，草茅疾苦可得切近了解，

更关键之处是他们的进退出入升降沉浮也决定于民众。此正是古人所云：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。

他对欧陆行政嬗变、体制、构架，了然于心，和中国的行政体系做切近、踏实的比勘校验。如谓吏治，倘有任何渎职现象，议院、总统就会过问，官吏则不能一日居其位，此即制衡之奇效也。对积弊之痛愤：“中国自秦汉以来，科条非不密也，其奉行而持守之者，非不严且明也，及其既也，适也束缚天下之君子，而便利天下之小人。”欲扫却这样的不堪之状况，他明言非开设议院不可。循名责实，至大至公，“何惧乎英、俄，何忧乎船炮？”制度路径乃是解决最棘手的社会问题的根由。

议院之形成、运作、规则、人员，议院立法之方式、形式，皆以英、德为例。其作用，“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，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，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，草野小民无所积其忿，故断不至数代而亡，一朝而灭”。

专制、专权，黑箱操作，一人说了算……这样的政体，社会个体都会为了生存不守规则，互相欺骗的恶果是加剧不安全感，坠入恶性循环的险恶之道。孟德斯鸠《论法的精神》尝谓“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，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。要防止滥用权力，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”。郑公发议，盖基于此。

当郑观应方痛切思索之际，在他稍前或同时，也有类似的嚶鸣之声。林则徐亦译亦撰的《四洲志》，介绍三十多个国家的人文、地理、历史，细部旁及行政、司

法、资源、风俗、技艺……种种,其中介绍美国十分详尽。于政事一端,他介绍说,“以汪申顿为首区,因无国王,遂设勃列西领一人,综理全国兵刑、赋税、官吏黜陟。然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,必与西业会议而后行,设所见不同,则三占从二……勃列西领四年一任,期满更代,如综理允协,通国举服,亦有再留一任者,总无世袭终身之事……”又详叙其大学、法政的教育,“迩来又增学习智识考察地理之馆,重刊欧罗巴书籍,人才辈出,往往奇异”。关于赋税,因其一开始为小政府大社会,所以,“当开国之初,轻税薄敛,原可足用”。遇到战争,因“兵少饷厚,故训练精强”,征收钱粮税饷都是良性循环。于美国民主制度隐约透露欣羨之情。因其书最早打开眼界,故尚有幼稚或令人哑然失笑之叙述,但当政经关键,却往往一语道着,就其深度、专注、身份、重要性而言,林则徐可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。

广东名儒梁章冉的《海国四说》,“未有统领,先有国法;法也者,人心之公也,统领限年而易……终未尝以人变法。既不能据而不退,又不能举以自代。其举其退,一公之民”。“为统领者,既知党非我树,私非我济,则亦惟有力守其法,于瞬息四年中,殚精竭神,求足以生去后之恩……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,必不可再之时,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?”谈政体的文字在这书中不太多,然一旦涉及,其认识往往深入骨髓,精到的眼光与把握令后世相当多的长文专论所望尘莫及。

其后魏源编撰巨著《海国图志》。“呜呼,弥利坚国,非有雄才泉杰之王也,涣散二十七部落,涣散数十万黔首,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,同仇一倡,不约成城,坚壁清野,绝其饷道,遂走强敌,尽复故疆,可不谓武乎!……二十七部酋,分东西二路,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,非惟不世及,且不四载即受代,一变古今官家之局,而人心翕然,可不谓公乎!议事听讼,选官举贤,皆自下始。众可可之,众否否之,众好好之,众恶恶之,三占从二,舍独洵同,即在下预议之人,亦先由公举,可不谓公乎!”他相当明确地肯定制度的约束力量,以及那种“最不坏”的巧妙设计,对议会架构的介绍与美誉对维新运动大有启发。

同时期的郭嵩焘,他不仅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,而

且是胸怀远远超越洋务意识的奇人。他曾襄助曾国藩出办团练,建湘军;中年时期至上海,接触西人西学;晚年力陈西方立国之本在政教,若仅于技术方面师其长技,乃舍本逐末。郭嵩焘出使英国,为中国遣使驻欧之始。两年多使外期间,有60万言记述,得出了“西洋国政一公之臣民,其君不以为私”,“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,适得其反”的结论。

他们都是在人人心窳败凋敝的社会风气中,真正的有心人,因其天才的洞见和深刻的睿智,成为19世纪的思想巨人。而以郑观应所述最为系统条畅,其思想的生成、结撰,不仅超越前人、傲视同侪,且也以其绝不缩水的思想重量,照出后人的庸常和反常。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高明如丁文江先生等,1933年夏天,他访问苏联和美国,为苏俄的计划经济及控制力而赞叹,随后他到美国,惊叹于美国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文明,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强大渗透,在摩天楼下由衷惊羨。然而,他并未将美国的繁荣现象归功于美国的经济或政治体制的出类拔萃。在丁先生的心目中,仿佛美国的强大与生俱来,天生如此,而非制度的优越。他对苏俄的访问,也没有像罗曼·罗兰那样表现拷问的责任或发现漏洞的坦率。他认为中国政治的混乱,“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,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,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,而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,而且没有负责的能力”。他说,“民主,仅是一种进行统治的实验形式”。丁先生推崇西方技术、现代行政组织方法、敬业精神、廉洁奉公等等信条,这都是智者的仁心仁术,但他显然忘了最重要的一点,即体制的决定作用,他过多地看中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,而忽略了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根本意义,以及普选、权力制衡、个人权利对社会生活、国民经济的根本支撑和保障作用。

丁文江缺乏郑观应那样的眼力和魄力,故其对大局认识尚未登堂入室、舍筏上岸。比他早几十年的郑观应,所反复推扬的却是“君主权偏于上,民主权偏于下,凡事上下院议定,君谓如实内即签名准行,君谓否,则发下再议,其立法之善,思虑之密,无逾于此……”他最看重的是“此制既立,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”。前后二者对比,高下立判。 